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丛书



书写 中国 文明史

江林昌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丛书

江林昌 主编

书写 中国 文明史



江林昌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写中国文明史/江林昌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文库)

ISBN 978-7-100-16293-7

I. ①书… II. ①江…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6863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书写中国文明史

江林昌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293-7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34

定价:120.00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十三五”
规划重大项目“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研究”成果



江林昌，1961年生，浙江杭州临安人。1978年，考入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81年7月—1988年8月，任浙江杭州临安教委中学教师与电大教师。1988年9月—1994年7月，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师从姜亮夫先生与崔富章先生。1996年9月—2000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历史学博士后研究，师从李学勤先生。1996—2001年，参加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任工程学术秘书。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2003年2月—2018年2月，当选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烟台大学副校长、烟台市人大副主任、烟台市政协副主席、民盟烟台市委主委等。现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楚辞（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主持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获省部级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三项等。

作者学术成果一览

一、主要著作

- 《诗骚合璧》(合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齐鲁书社,1998年。
- 《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 《中国古代文明与学术史》(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 《〈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中华书局,2011年。
- 《清华简与儒家经典》(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 《诗经与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二、主要论文

- 《〈楚辞〉中所见殷族先公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 《〈商颂〉与商汤之亳》,《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 《由甲骨文资料试拟商族先公世系》,《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 《楚简〈诗论〉与早期经学史的有关问题》,《中国哲学》第24辑,2002年。
- 《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 《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东岳论丛》2007年第2期。
- 《借鉴国外理论,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理论体系》,《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 《“图”与“书”:先秦两汉山川神怪文献分析》,《文学遗产》2008年第6期。
- 《诗的源起及其早期发展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 《原始宗教对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影响》,《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
- 《清华简与先秦诗乐舞传统》,《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
- 《民族典册的形成与儒家“述而不作”的意义》,《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 《从原始“意象”到人文“兴象”“寄象”》,《文艺研究》2017年第12期。
- 《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建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 《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目 录

绪 论	1
书写中国文明史	
——构建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	3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论建构	17
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19
国学研究步入简帛时代	30
既要借鉴国外理论，更应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的理论体系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与中国“早期文明”	65
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与夏商周社会若干问题	
——读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83
论原始宗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影响	
——以“绝地天通”“铸鼎象物”为例	99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129
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鸟瞰	131
中国文明的时间早期性与空间广阔性	153
中国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	177
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全在中原 ——对传世先秦秦汉文献的再思考	195
论虞代文明 ——再论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全在中原	229
第三章 中国古代文明的世系与年代	263
由世系探索炎、黄两族起源发展的时与地	265
新出夔公盨铭与夏禹问题	281
由甲骨文“周祭”“贡典祭”论上甲六示为商族信史时代的开始	289
由甲骨文资料试拟商族先公世系	298
试论商族首领继承制发展的三个阶段	312
眉县新出青铜器与西周王室世系、年代学及相关问题	330
由新出夔公盨、逯氏铜器论夏商周世系及虞代问题	351
古代文明的年代序列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376
第四章 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比较分析	437
汉字与巫术通神、宗教祭祀	439
汉字与民族融合、文明绵延	450
汉字与古埃及、苏美尔文字的比较	455
东西方“轴心文明”的比较	467
中国古文明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原生态古文明之一	484

中国文明的起源路径与西方文明不同·····	494
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与西方文明不同·····	513
从世界古代史看中国古文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	523
后 记 ·····	533

绪 论

书写中国文明史

——构建中国特色文史学科理论体系浅议

地理环境的不同，必然会使人类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这种不同，在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整个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在讨论古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时，往往套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术语，结果造成了许多误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多种场合强调，要坚持中国立场，总结中国理论，增强文化自信。尤其是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因此，习近平号召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近年来，我们围绕上述讲话精神，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三方面做了不懈努力。本论著《书写中国文明史》即是其中的部分成果。作为绪论，兹将基本思路做一概要交代。

一、用中国理论、中国概念，全面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明发展史

大家都以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之一而自豪。实际上，中国古文明的独立起源方式与西方古文明大不相同，中国古文明的发展过程也与西方古文明有许多相异之处。西方的文明理论、史学理论不能套用于中国古代文明史，但可以作为参照系，通过比较，揭示中国的特色。

例如，西方学者通过对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的研究，从考古学上提出了判断文明起源的四项物质标准，即文字、青铜器、城市和宗教礼仪建筑。中国古代文明多源并起，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概括为六大文明起源区，遍及黄河上下、长江南北、长城内外。^①以这四项标准对照中国六大文明起源区，黄河流域大致相合，其他区域则不能完全对应。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黄河以外地区的文明起源。事实上，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其典型的宗教礼仪建筑与精美绝伦的玉器，足以表明当时的社会已分化成不同的阶层，氏族公共权力已高度集中，其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地区，而且这些代表神权、族权、兵权的玉器，在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其他文明区也都具备。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独有物质要素，为世界上其他独立起源的古文明所不可比拟。因此，牟永抗、曲石、吴汝祚、林华东、安志敏等考古学家在20世纪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四章《“条块”说》、第五章《满天星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08页。

90年代即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的新判断^①，以区别于西方的古代文明。

在古代文献上，早在东汉时期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记载风胡子论古史时就已提到了玉器时代：

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以铁为兵，……此铁亦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这“以石为兵”的神农、赫胥之时，是原始时代，而“以玉为兵”的黄帝之时，正是五帝文明起源阶段。其“玉器”不是生产工具，而是礼器，往往制作成内圆外方以象征天地的玉琮，作为巫师沟通天地神灵的法器；或制作成斧斤形以象征权力的玉钺，作为酋长发号施令的凭证等。此即所谓“夫玉亦神物，又遇圣主使然”之意。“以铜为兵”的禹穴之时，指的是夏商周青铜时代，这是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以铁为兵”之时则是秦汉以后的铁器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成熟发展阶段。这石、玉、铜、铁四个发展阶段，与中国近百年来现代考古发掘所揭示的物质证据正相吻合。这应该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事实。

这一历史事实与西方古代社会相比，多出了一个“玉器时代”，而这又恰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因此，称中国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在概念上正可以与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远古文化史》称西方古文明起源于

^① 牟永抗、吴汝祚：《试谈玉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日；曲石：《中国玉器时代及社会性质的考古学观察》，《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吴汝祚：《玉器时代说》，《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林华东：《玉器时代管窥》，《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安志敏：《关于玉器时代说的溯源》，《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城市革命”相区别。这对构建中国自己的文明起源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指出：“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比起中国来，中间缺了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为玉器在西方没有在中国那样的重要。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而这种转变在中国社会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①

以上是从考古学角度说明建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理论的必要性。我们再从社会学角度看，同样需要建立自己的相关理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通过对古希腊、罗马等西方社会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分析，总结出文明起源在社会形态上必然出现两个变化：其一是血缘管理变为地缘管理；其二是平等社会变成阶层社会，因而出现了管理这阶层社会的公共权力。以这两点来对照中国，可以发现，中国文明起源后的社会状态，只出现了第二种情况，即公共权力；而第一种情况，血缘管理变为地缘管理却没有发生。中国从五帝时代开始了文明起源，而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模式依然延续下来。直到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阶段，还是血缘管理。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前后经历了近三千年时间，占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五分之三。在这漫长的文明时期，公共权力一直在血缘管理的框架内发挥作用，而且还发挥得相当和谐、有效。这不能不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点。中国的地缘管理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秦汉以后才实施的，所以我们称秦汉以后才是中国的成熟文明发展阶段。然而，虽然秦汉以后全国的王权统治是地缘的，但在中央政府的王权传承仍然表现为父子孙世袭的血缘制，所谓一朝即一姓，如汉代为刘姓王朝，唐代为李姓王朝，

^① 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04页。

宋代为赵姓王朝，明代为朱姓王朝，等等。这种地缘管理与血缘管理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成熟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国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特征所在。

根据中国文明起源后血缘管理依然延续的特点，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称这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旧纠葛”的路径。公共权力是“新”出现的，而血缘管理是原始氏族社会旧有的，是“陈”的，但在文明社会里保留下来了，与“新”的公共权力结合，所以说是“新旧纠葛”。这实际上是一种“维新的模式”。西方文明起源后，公共权力是“新”的，地缘管理是“陈”的，而原来的平等社会、血缘管理都没有了，所以侯外庐先生称西方的文明起源是“新陈代谢”的路径，是一种“革新的模式”。^①张光直先生则从考古学角度称中国文明起源的这种特点为“连续性的”，而西方的文明起源则是“破裂性的”。^②

必须指出的是，前面讨论的中国文明起源于“玉器时代”，是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中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但这个过渡阶段经历得特别长，占了中国五帝文明起源一千年左右的时间，这恰好与社会形态上表现为“新旧纠葛”的“维新渐进”路径相一致。西方文明直接从石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经历时间短，因而表现为“新陈代谢”的“革新激进”的路径。中国文明在经历了一千年文明起源之后，又经历了两千年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这也是在西方文明史上所不曾有过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延续了血缘管理。这一点很重要，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血缘管理，造成了五帝至夏商周漫长的巫史传统、发达的原始宗教以及世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以诸子学派的繁荣为代表的“轴心”文明，秦汉以后出

①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②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84—496页。

现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多民族相融合的绵延发展的成熟文明，也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科学分析、全面总结、理论概括上述中国文明的特色现象，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早在1946年，侯外庐先生就已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中提出上述东西方文明起源路径不同的卓见。张光直先生的《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也于1986年发表在《九州学刊》上。牟永抗等先生的“玉器时代说”也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提出。中国文明走的是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起源、发展规律，是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所不曾有过的。然而，这么重要而且明显的事实却不能通过教科书走进大学讲堂，更不用说在中小学教学中普及推广了，以致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发展特点茫然不知。这不能不说是民族历史文化的不负责任，令人痛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观念上，我们还没有摆脱西方理论话语中心的束缚，对民族历史文化缺乏自觉自信。其次，管理体制上有问题。从事前沿研究的一流专家最有资格编写教材，但他们没有时间，而实际编教材的人大多不是学科研究一线的专家，他们自己都还没有深入研究，哪能吸收前沿科研成果，编出优秀的教材？

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明史，还有许多深层次、系统性的工作要做。例如，为什么中国文明的起源会在物质上表现为玉器作为公共权力的象征，而在社会管理结构上又表现为血缘系统的延续、扩大？这应该从中国特殊的地理、气候、资源条件与农耕生产方式中寻找答案。又如，中华文明在五帝时代多源并起后，至夏商周三代为什么会向中原集中？这当中，东夷古文化、良渚古文化、红山古文化对中原王官礼制文化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再如，按照西方的理论定义，“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而中国的文字发明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是为了与神灵的沟通，是神权、族权、政权的象征。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及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